



文化转型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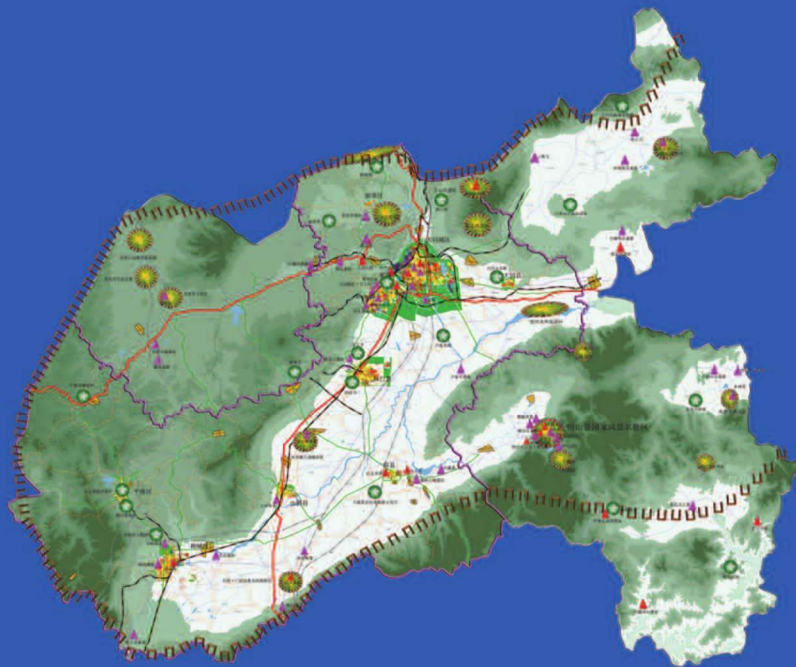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规划研究

——内容·层系·方法·案例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Planning in China

— Contents, Gradations, Methods, Cases

杨永春 赵四东 李伟伟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转型:中国文化规划研究:内容、层系、方法、
案例 / 杨永春,赵四东,李伟伟著. —兰州:兰州
大学出版社,2013. 3

ISBN 978-7-311-04085-7

I. ①文… II. ①杨… ②赵… ③李… III. ①城市文
化—文化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0402 号

责任编辑 陈红升 徐 瑞
封面设计 余 音

书 名	文化转型:中国文化规划研究 ——内容、层系、方法、案例
作 者	杨永春 赵四东 李伟伟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 (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 (营销中心) 0931-891429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307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085-7
定 价	2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言

清末以来,西方的民主思想、现代化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等进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令人炫目的剧烈碰撞,中国传统文化被不断改造,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多元、融合、混合的中华新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巨大的弹性、韧性和厚度。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转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840—1911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文化体系的形成。这个时期主要指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化、现代化思想的碰撞。二是1911—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文化价值观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西方现代化思想的融合,形成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旧民主主义的混合文化体系。三是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将旧民主主义的混合文化体系塑造整合为社会主义的新传统现代文化体系。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与传统中国文化碰撞后,传统中国文化被改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迅速根植。四是1978年至今,市场经济体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迅速渗透,冲击了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熏陶多年所形成的中国新传统文化体系,形成了中国转型期的新文化类型,即由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向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基、兼有社会主义思潮和西方部分文化价值观的三元一体的中华新文化模式演进。

中国此次的文化转型对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体系的新形态、新格局、新模式的塑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几乎涉及文化各领域的重塑和重构。进入21世纪,党中央非常重视文化建设,逐步提出了建设文化大国的构想和目标。由此,文化规划对学术界、规划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中国21世纪的新文化特征的内涵、中国文化规划的理论基础、中国文化规划如何融入现有规划体系、中国文化规划的方法等。

当前,中国文化规划存在以下核心问题:第一,过于注重物质层面,缺乏对非物质领域的关注。第二,过于采用商业模式,以利益为主导,浅薄和表层的开发普遍化,建构过程忽视了区域或城市文化转型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第三,无法理性、科学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外来文化,导致城市规划中的地域性文化元素和全球化的外来文化元素的表达出现了混合或混乱。第四,浮躁和快速成为主流。如将文化建设理解为文化产业、部分文化地域景观建设所谓的文化化,但真正的文化建设应渗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体现在城市大众的人文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

中国文化规划的兴起包括城市发展阶段及文化需求的驱动、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的推动、城市文化同化现象传播与蔓延及文化建设滞后的迫动、基于文化的全球城市竞争的诱动、城市规划本质重申呼唤文化规划的引入等五大核心动力要素。文化及文化规划

发展理论领域存在文化规划及其文化概念有待明确(特别要明确“文化规划”并非“规划文化”,“文化规划”也并非为解决所有社会文化发展问题的万能药)、文化规划基本内容和方法体系亟待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文化规划体系及其与城市规划体系有待整合三大挑战。

根据城市规划(与设计)学、地理学、文化学、文化生态学、景观学等领域的相关成果,中国文化发展与规划迄今可归纳为八大理论基础。

因此,中国文化规划目标系统包含目的需要、目标体系和指标标准三个层级。文化规划的基本价值取向应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以及从权贵向度转向市民向度,聚焦于城市公共环境和文化设施等与城市居民生活的互动支持。同时,将文化规划引入城市规划体系,可从规划理念、程序、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城市规划提供改进和完善,其中最基本的是理念层面,其次是方法,而程序的改进可能涉及机制的调整而较为困难,但对于规划实施过程而言也最为关键。文化规划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综合性、层级性、适时性、倡导性、政策性、法规性、代言性、联络性的专项规划,服从于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分为区域(宏观)、城市(中观)、社区(微观)三个层次。区域文化规划强调理论性、政策性、引导性,一般采取自上而下的规划编制模式,规划内容具有综合性和战略性特点。城市文化规划编制强调城市文化管理和发展能力建设,具有综合性特征。社区文化规划编制强调文化活动和文化自主性,一般采取自下而上的编制模式,鼓励社区居民和公众对文化发展和文化活动的参与,可被视为一种聚焦于社区文化资源、文化需求和发展机会的公众化过程。文化规划的方法体系由文化发展现状评估方法、文化规划的基本规划方法、文化规划及其实施效应评估方法三部分构成。文化规划实施效应的评估应着重于空间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四个方面。

中国文化规划成功与否的根本之处在于我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文化新形态、新模式、新体系的认知和科学理解。今后应强化中华文化内涵演变的研究,重视文化规划中的深度化、系统化和长尺度的要求以及空间布局和实施效应评估,深化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产业、教育培训等专项性文化规划的研究,推动中国文化规划的知识规范化、职业地位制度化以及引导社会的普遍认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规划的内容体系、框架模式和方法。

本书是在我的研究生赵四东同学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我们试图从完善城市规划理论方法体系的视角,尝试构建中国转型期城市规划体系中的文化规划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并进行了若干实证分析。

笔者十分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宋长青主任和冷疏影研究员、兰州大学陈发虎副校长等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而且,在本书写作期间,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齐君所长、王娟工程师,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牛慧恩总工程师等同仁提出了宝贵意见,兰州大学出版社陈红升主任在本书出版期间提供了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谨将本书献给中国史无前例的民族复兴伟业,期待中国的东方文化转型成为中国古老文化新生和全球文化转型的成功典范!

杨永春

2012年9月于兰州

目 录

第 1 章 概念界定、进展评介与内容体系	001
1.1 相关概念的内涵界定	001
1.2 国外研究进展及其局限性	006
1.3 国内相关研究和实践进展	011
1.4 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评价	016
1.5 科学问题、内容体系与研究方法	023
第 2 章 文化发展与规划的理论基础	025
2.1 文化价值观变迁和转型理论	025
2.2 文化地域分异性和多样性理论	026
2.3 文化系统论和文化生态学理论	028
2.4 文化发展演化和异质共生理论	031
2.5 文化发展的时间—空间系统理论	033
2.6 城市文化编码与译码互动理论	037
2.7 城市意象理论和图底关系理论	039
2.8 地方场所精神和文脉主义理论	042
第 3 章 文化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理论框架	046
3.1 文化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流程	046
3.2 文化规划的原则理念	047
3.3 文化规划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系统	048
3.4 文化规划的基本内容与层系设计	054
3.5 文化规划及其实施效应评估	065
第 4 章 文化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方法体系	070
4.1 文化发展现状的评估方法	070

4.2	文化规划基本规划方法	085
4.3	文化规划实施效果评估方法	100
第 5 章	转型期中国文化规划的目标、内容和措施	103
5.1	规划目标	103
5.2	基本方针与原则	104
5.3	内容体系	105
5.4	特点与趋势	114
5.5	决策变化	114
5.6	保障措施	115
第 6 章	区域案例：晋北城镇群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构想	118
6.1	背景解读与现状分析	118
6.2	文化特色凝练和目标战略	132
6.3	发展路径与空间布局规划构想	146
6.4	行动项目规划和关键保障措施	157
第 7 章	城市案例：成都、深圳和夏河县城的文化建设	160
7.1	成都市的地方特色文化都市和休闲城市建设	160
7.2	深圳市文化立市战略空间发展规划	164
7.3	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案例：甘肃省夏河县城文化风貌转型	179
第 8 章	社区案例：深圳市桃源居社区文化规划	185
8.1	社区文化背景环境和发展历程分析	185
8.2	社区文化发展目标与战略	188
8.3	社区文化体系发展与空间布局	190
8.4	社区文化发展保障措施	195
8.5	实施效果评估和规划评论	196
参考文献		198

第1章 概念界定、进展评介与内容体系

文化转型是中国 21 世纪前半叶的核心任务。2000 年以来中国已进入到以地方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规划的探索阶段,面临着诸多困惑和问题。

1.1 相关概念的内涵界定

1. 文化

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关于文化的定义有 160 多种,众说纷纭,迄今尚未形成一个严格和公认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之父泰勒(1992)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迄今,这个定义最有影响力。

一些学者将文化作为社会认同符号,如美国欧·奥尔特曼、马·切默斯在其《文化与环境》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的信念和知觉、价值观和准则、习俗和行为,可用来表示认识、知觉和行为以意见一致的方式为某一群体的人所共有,也意味着把人们共有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样式传授给其他人,尤其是儿童,以及对该文化新成员的教育使之适合社会需要,有助于一代一代地保持意见一致。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习俗涉及的不仅是“内心的”和“行为的”过程,也出现在物和物质环境中。因此,英国文化研究大师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包含了整个生活方式,不论物质的、知识的还是精神上的”。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化概念》一书中提到的那样,“文化”是英文中三个最为复杂的词汇之一。黎德扬 1997 年把文化定义为既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切成果的总和,同时也是“人化”和“化人”的动态过程,且“人化”就是给外在世界打上人类思想和意志的烙印,而“化人”则是指文化教化和塑造人的思想、观点、品德和行为等。

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根据不同标准可划分为多种类别,如常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在它所涵盖的范围内和不同的层面发挥着整合、导向、维持秩序等主要的功能和作用,如在整合功能上文化可作为群体成员之间沟通的中介,

刺激和促进他们有效沟通,实现消除隔阂和促成合作效用等。

书中有关文化的定义遵循一般性理解,即广义上将文化视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只将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视为文化(刘文俭等,2005)。因此,笔者结合文化自身的深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以及中国当前发展之现实背景,将其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层次。其中,物质文化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行为文化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见之于日常起居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与通常所说的心态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相通。

2. 城市文化

城市与文化的联姻源于历史进程。城市是文化成长的摇篮,成为人类文明的保管者与积攒者。然而,城市文化来源于文化的发生,但城市文化并不是“城市”与“文化”的简单相加(李坚等,2006),城市文化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范畴,具有文化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城市”和“文化”两者共同滋养着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形成对城市文化的深入理解(单霁翔,2007)。全球化进程中的各国的城市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水平,甚至已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甚至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其衡量标准是该城市的文化建设是否具有先进的理念、良好的传承能力、巨大的感召力和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能力。

目前,对于城市文化的定义主要存在两种思路。一是从文化的定义推理演绎,如台湾学者张丽堂(1983)援用了泰勒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将城市文化定义为人类生活于都市社会组织中,所具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一切都市社会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及习惯(彭传义,2011)。郑卫民(2005)援用了广义文化的定义,认为城市文化简单地说是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二是从城市本身的特征出发进行定义,例如《中外城市知识辞典》(刘国光,1991)认为城市文化往往也被称为“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具有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秦启文(2004)认为城市文化是指生活在城市区域内的人们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对象化活动中,所共同创造的行为方式、组织结构和道德规范,以及这种活动所形成的具有地域性(或城市特色)的典章制度、观念形态、知识体系、风俗习惯、心理状态、技术和艺术成果(彭传义,2011)。

但是,由于城市文化的复杂性,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往往通过明确城市文化的具体对象而达到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唐永进(1999)指出城市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涵市民文化、旅游文化、商业文化、社团文化、夜市文化等软件内容,又包括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硬件设施。任致远(2009)认为城市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文化、山水文化、布局文化、历史文化、建筑文化、景观文化、社区文化、地名文化及其他文化。

上述两类定义以第一种接受度为高,多数研究者从文化定义和研究需要出发,将城市文化视为以城市为载体和表现方式的文化类型,是特定的城市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所形成的综合体,具有聚集性或集中性、层次性、辐射性、地域性、多元异质性、复杂性等基本特征,其不仅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而存在,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力而存在。城市文化和城市实体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从城市视角看,城市是文化的沉积、容器、载体、舞台等;从文化视角看,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保存城市记忆,明确城市定位,决定城市品质,展示城市风貌,塑造城市精神和支撑城市发展(单霁翔,2007)。城市建设创造城市空间形成城市文化,城市建设更新历史空间发展城市文化,城市建设破坏载体空间淹没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塑造规划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城市文化制约规划决策制度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彭传义,2011)。随着城市文化发展热潮的兴起,地理学、城市规划、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和经济学等纷纷掀起城市文化研究热潮,并迅速占领各自的领地,发表了一批不错的成果(图 1-1)。

3.文化转型

转型研究的空间尺度大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小到城市转型,而且其涉及学科范围亦十分广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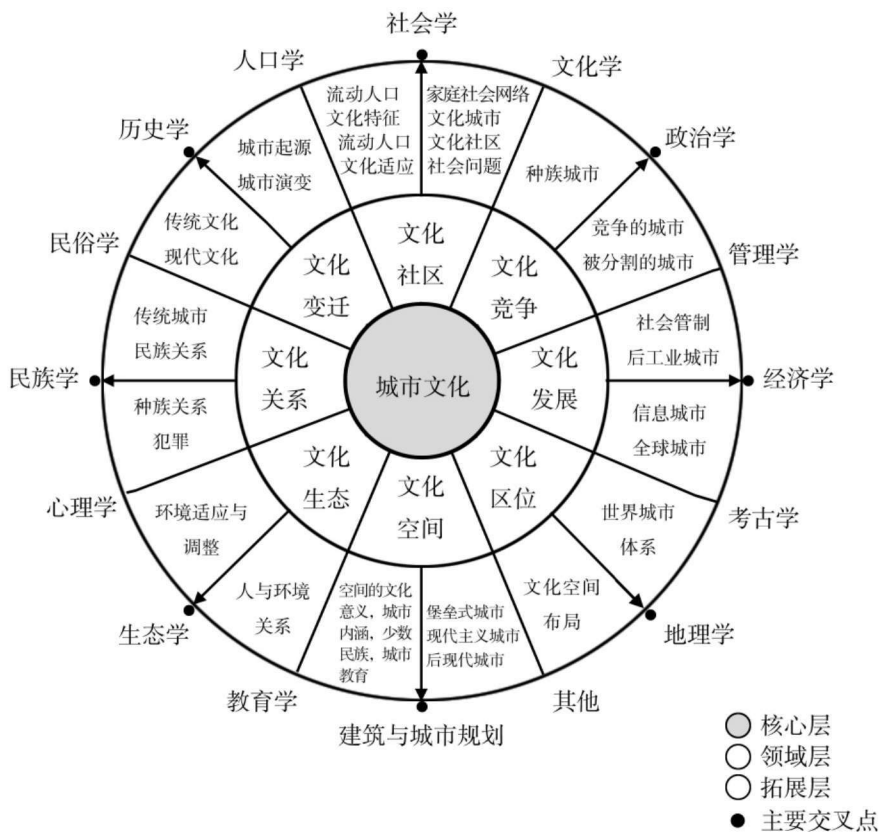


图1-1 城市文化研究框架(沈清基等,2007)

社会科学的学者一般把“转型”理解为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即从基于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张良等,2006)。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型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要通过完全的制度替换和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来废除以前的制度(徐瑛等,2007),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一般囿于经济层面。不过,Roland(2002)把“转型”理解为“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转型意味着“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或转变为另一种国家或政体”(Kasper et al,2000),如基于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张良等,2006),以及“转型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Sacks,2000),而科尔奈(2000)则认为“转型是一个大概念,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转型并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转型、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因此必须基于多维度考察转型”。

这样,可把文化转型理解为广义的文化系统的大规模变迁过程,本质是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转型的基础上,文化价值观的一系列变迁或文化现象的创新。文化转型必然与政治、经济、社会系统的变迁相辅相成。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转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840—1911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文化体系的形成。这个时期主要指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化、现代化思想的碰撞。二是1911—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文化价值观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西方现代化思想的融合,形成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旧民主主义的混合文化体系。三是1949—1978年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将旧民主主义的混合文化体系塑造整合为社会主义的新传统现代文化体系。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与传统中国文化碰撞后,传统中国文化被改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迅速根植。四是1978年至今,市场经济体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迅速渗透,冲击了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熏陶多年所形成的中国新传统文化体系,形成了中国转型期的新文化类型,即由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向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基、兼有社会主义思潮和西方部分文化价值观的三元一体的中华新文化模式演进。

转型期,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混沌的转型特点与路径:(1)文化子系统的转型速度缓慢不一,中国文化转型的混合特征显著。政治文化依然保留强大的传统性质,经济文化逐步转向商业功利文化,社会文化习俗表现为步调不一的分层化、分区化的差异化转型特征。事实上,对于那些不涉及政治敏感性和社会不安定、具有强烈经济利益的领域,文化转型的速度最快,如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婚姻文化、享乐文化等。(2)在市场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功利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相互融合和演化中,基本主导了中国文化转型方向。(3)不同人群的文化转向呈现出裂变趋势。(4)不同地域的文化转型呈现差异性。

因此,清末以来,西方的民主思想、现代化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等进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令人炫目的剧烈碰撞,中国传统文化被不断改造,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多元、融合、混合的中华新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巨大的弹性、韧性和厚度。中国此次的文化转型对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体系的新形态、新格局、新模式的塑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几乎涉及文化各领域的重塑和重构。进入21世纪,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建设文化大国的构想和目标,这对中国文化转型和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4.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产业,其中间产品和服务是最具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具有广泛的关联带动作用。新技术革命为文化功能的扩展提供了新的手段,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文化业态,如网络服务、动漫游戏、数字媒体、手机视频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明显提高。目前,文化产业与旅游、休闲、制造、电信、交通、房地产等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正在发生普遍的渗透和融合,形成以文化内容为纽带、关联度日益密切的庞大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蔡灵 等,2012)。

5. 文化规划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型,城市文化产业兴起,从而推动了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的探索与建立。“文化规划”的正式提法见于 1979 年的出版物《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一文中,哈维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区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社会目的(Perloff et al,1979;黄鹤,2005,2010;李祎 等,2007)。Deborah Mills 认为文化在规划中具有重大作用,并建议地方政府采用“观赏之道”文化。

文化规划出现后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并试图从不同角度界定“文化规划”的概念,然而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迄今为止“文化规划”尚没有获得一个被普遍认可的、令人满意的定义。

黄鹤(2005,2010)系统地总结了国外一些权威性机构和研究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表 1-1),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文化规划”并不等于“规划文化”,“文化规划”被视为一种平衡居民文化需求和城市文化发展的方法及促进城市发展的工具,“文化规划”中的“文化”并非狭义上的“艺术”,更非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而是被限定为“能够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两类:(1)历史文化资源,如地方历史文化遗迹、文物、文化街区、传统手工技艺、风俗传统、节日庆典、文学传说、饮食文化和方言等;(2)当代文化资源,如文化创意产业、艺术和媒体机构及其活动、文化娱乐设施、文化生产和消费场所、城市公共空间和开放绿地、文化活动和教育培训等。

表1-1 国外一些权威性机构和研究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一览表(黄鹤,2005,2010)

定义制定者或机构	定义的内容	定义的特点
英国 De Montfort 大学国际文化规划和文化政策研究室以及英国学者 Graeme Evans	文化规划一方面是城市和社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战略性以及整体性的运用,另一方面也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是城市文化艺术表达的整体性	强调“文化规划”是各类规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较广泛的认可度
英国文化策略研究机构 Comedia 的负责人 Charles Landry	文化规划是一种基于文化资源的确认项目、制定规划和管理实施策略的过程,是城市规划和城市政策的一种文化途径	强调“文化规划”不等于“规划文化”
美国学者 Craig Dreeszen	文化规划是结构性的、社区层面上基于调查研究 and 集体意识建构的过程,确定文化资源、社区需求和发展机会;规划行动和保护相应的资源以对上述需求和机会做出回应	强调“文化规划”的自下而上运作和集体意识构建,回应居民文化需求

当前,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存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承载主体,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文化事业涵盖文化产业,狭义文化事业是相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的,一般指国家有目的、有重点地无偿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事业。文化产业则由产业实质和文化属性两部分组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新中国成立后公有制体制和计划经济的实行使得所有文化生产和服务均为事业单位,文化事业长足发展。1978年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激发了文化产业的发展。2002年脱胎于文化事业的文化产业终于实现了独立发展。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城市文化发展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互关联,互动发展。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赢利作为主要目的,同时还要结合机构或主体性质、资金或资本来源差异、运营机制和调控方式的不同等方面予以区分。

针对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认为(城市)文化规划是指对城市文化资源进行战略性和整体性的计划和安排,从而实现城市文化的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的统一协调,实现城市文化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实现城市文化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对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作用。一个具有清晰的文化规划的城市才能体现其文化价值,并使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因此,笔者认为从城市规划视角看,文化规划既是一种针对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互动响应的规划方法,更是以文化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其通过城市发展过程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促使城市发展“软”、“硬”环境的双修,以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和适宜性,尤其是城市的文化自信和凝聚力,推动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应成为城市规划及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文化资源的战略性和策略性的运用必须立足于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对当代文化资源的科学化建设以及对未来文化资源的战略性培育,尊重和发扬地方所独有的文化特征,并在这一过程中时时响应和引导地方居民的文化需求。文化规划作为一种方法体系为城市规划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文化的视角,促使城市规划由长期以物质空间开发规划为主导的单翼飞行转型为“软硬”双翼发展,推动城市规划运用多维的综合之眼来观察和引导城市向更高目标、层次发展。

1.2 国外研究进展及其局限性

国外文化规划实践和理论探索基本同步。黄鹤(2005,2010)、李祎等(2007)已对国外权威机构和研究学者有关西方文化规划的发展实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将国外文化规划的发展实践梳理归结为以下四个阶段。

1.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以福利政策为核心的观念兴起阶段

从西方国家的文化与城市发展和规划相互关系看,文化规划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

代的战后城市重建时期。60年代兴起的环境行为学等研究,着重探讨了城市空间与使用者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将城市空间视为人们心理性和价值观等社会文化因素下的产物,认为文化对于城市空间发展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为情感价值和美学价值。当时,西方城市对文化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以欧洲高雅艺术为核心的精神层面,文化与城市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以及规划师将文化定义为“独立并相对于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的领域”,受浓厚技术决定论影响,认为文化能够弥补动荡后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创伤,并企图以形体和环境秩序来规范社会生活和引导人们精神回归安宁,因而推动了以社会文化福利政策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最主要的城市文化建设形式表现为建造和拓展城市传统物质文化设施和公共空间等,如重建、新建或扩建城市歌剧院和博物馆等。

此时期,有关城市和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即文化和城市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文化关注于精神活动,城市物质建设回应物质生活需求,将两面一体的发展割裂为二元对立或并立的发展。人们面临的生活环境不仅实现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关怀,往往还造成了文化感染力的缺乏。当时,城市规划建设中往往更欢迎“国际风格”,而不能对地方传统和地域文化予以回应,导致居民具有不知身在何地的感受。受此和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西方社会运动(女权运动、社区运动、环保运动和种族运动等)的共同刺激,城市文化策略开始与城市设计和规划相结合,以创造更具有吸引力和具有广泛认同性的城市为出发点,兴起了大规模建造公共活动空间的热潮。此时期,城市文化政策以社会和政治目标为焦点,参与到衰败地区的更新改造等过程中,但文化的经济作用还不够明晰,文化的资本含义仍没有体现出来,文化策略与城市策略相结合的探讨仍然局限于局部地区。也就是说,文化规划仅处于萌芽状态。

文化规划在西方国家城市的兴起源于城市环境建设对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回应以及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与促进作用。将文化理解为“引诱资本之物”,直接解放了文化生产力,使得文化与城市和经济发展直接关联,促进了文化规划的突变式兴起。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城市面对全球化、产业转型和郊区化的三重压力,出现了结构性危机。这个危机首先映射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产业结构性危机,导致传统制造业和相关供应服务业结构性衰退或空间转移;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震荡快速传递到城市发展层面,显现在城市面貌上出现了荒废的工业区、破败的港口区、废弃的老城区等,并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通过对战后重建以来发展经验的总结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文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潜在作用,鼓励作为城市灵魂的文化与资本相结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更新(黄鹤,2005),即城市政府开始了通过改善城市面貌来积极吸引投资与人才,从而带来城市和经济复兴的实践探索,引发了文化规划的真正兴起。

2. 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的相关理论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从而导致了以人才为资本和以文化为生产力的文化产业地位的迅速升高,文化产业被普遍视为未来经济新的支柱和引擎。结合以前关于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更新与复兴的实践探索,多数政府认为人力资本将是决定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城市只有通过塑造高

品质的文化环境和优越的生活质量,以吸引人力资本和影响企业的投资与布局,大力扶持发展文化产业,才可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和城市秩序中寻求一席之地。许多西方城市开始了局部或全面的文化规划实践,文化的内涵也从“引诱资本之物”发展演变为“地区发展资本”。

此时期,文化规划被规划师和地方当局普遍视为能为城市中心重新注入活力或城市更新的一种标准方法(Levine et al,1997)。文化规划主要以发展经济为目标,即城市有意识地运用文化资源来改变城市面貌,并采取改变城市形象、推动文化旅游、建设文化服务设施等措施,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推进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更新。在众多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毕尔巴鄂、格拉斯哥、利物浦、伯明翰和舍费尔尔德等先行者,逐渐摸索形成了几种经典的城市更新模式。这些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众多模仿者,包括结合文化设施建设的城市更新、结合文化活动举办的城市更新和结合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更新三种,并对应形成了装饰性、旅游性和产业性文化政策(Frith,1991)(表 1-2)。它们的共同点往往是通过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文化项目建设,尤其是博物馆等(Zukin,1995)旗舰类文化项目,促进城市中心区公共领域的发展。

表1-2 20世纪80年代西方典型文化主导城市更新模式一览表(黄鹤,2010)

模式类型	采取文化政策类型	模式适用条件	空间响应	主要做法	典型案例
结合文化设施建设的城市更新	装饰型文化政策	美化城市形象,增强城市吸引力	文化消费空间	文化设施建设、城市公共艺术、雕塑建设等	毕尔巴鄂
结合文化活动举办的城市更新	旅游型文化政策	推动城市文化旅游发展	文化消费空间	保护历史文化资源,举办文化活动、文化节庆等	格拉斯哥
结合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更新	产业型文化政策	当地文化产品和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相关产品生产	文化生产空间	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文化产业企业培育等	舍费尔尔德

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予以研究,如从社会学角度关注文化符号如何使得衰败地区获得重新发展以及地方社会文化发展(Booth et al, 1993; Zukin, 1989; Sudjic, 2001),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城市文化政策对城市更新以及经济再生所起的作用(Bianchini et al, 1993),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探讨文化规划的手段(Farrel, 2000),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到底有没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Gomez, 1998; Plaza, 1999; Stevensm, 2003),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成效(Bassett, 1993; Sudjic, 2001)等。总体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规划在利用城市文化特色和文化资源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改善城市面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但也存在诸如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旗舰文化项目建设而难以回应当地居民文化需求与文化设施分布不均衡等问题(Chang, 2000),被批评为“不可持续的文化投资模式”(Evans, 2001)。因此,80 年代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文化主导型城市更新式文化规划对文化规划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突破,文化规划受到前所未有的讨论和关注,文化规划作为地方发展政策或策略之一迅速发展并在广域范围内得以推广,文化规划的地位基本确立。

3. 20 世纪 90 年代以社会经济综合目标主导的基本成熟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文化主导型城市更新过于狭隘地关注经济发展和物质更新,在实施过程中引起了城市中心区绅士化、城市中心区和边缘地区的非均衡等问题,从而引发了 90 年代有关文化规划的普遍讨论。90 年代以来,关于全球化体系中的文化过程、城市发展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间的冲突等研究领域受到诸多关注,围绕“空间、文化、权利、认同、全球化和地域化”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从而使得文化逐渐成为社会认同的符号。如米歇尔·福柯提出权利和话语理论,爱德华·赛义德等人的后殖民文化理论指出文化价值领域存在“中心—边缘”现象以及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文化支配现象,《认同的空间》则从欧洲的角度论述了以地方文化多元化为代表的欧洲如何通过媒体与信息业的发展来抵御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全球化冲击等。通过对以往实践的反思,强调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文化规划在西方城市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付诸实施。文化规划在运用城市文化资源获得经济收益和人文复兴的同时,更强调社会公正和文化发展相关方的普遍参与,通过协商沟通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不仅明确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消解了文化的非功利色彩,更指出文化为不同群体和城市之间的竞争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Jusin O'Connor 和张鸿雁等进一步将城市的文化资本分解为城市的文化特色和城市形象,并指出其是城市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进行城市营销的资本等,引导了文化导向城市更新和城市文化复兴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全球范围内城市内部衰败区的“绅士化”和文化导向型的城市更新如火如荼,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并蓬勃发展,建筑、公园、街道成为城市文化重要的视觉表述载体和文化领域投资的重点等现象的广域推开无不说明:城市文化要素以及视觉表达同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化已经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本。

20 世纪 90 年代,文化已被视为“整体生活方式”。立足于此的文化规划强调通过空间、经济和社会文化等综合的规划引导手段,关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层面目标的有机协调发展,侧重与推进社会文化公正性和公众参与。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聚焦于文化资源、文化需求和发展机会的公众化过程,文化发展和规划已成为多数西方城市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得到地方和州政府联盟的支持,并将文化规划引入城市规划之中(Dreeszen, 1997),与经济规划、基础设施规划、环境规划等同时作为地方政府的规划内容。在澳大利亚,文化规划被视为“是针对文化发展有明确目的和政策的方法……如同其他任何形式的规划一样,通过对现有状况的彻底评估,通过制定明确的目标,通过确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并付诸实施”(Guppy, 1997)。

文化规划中综合目标或整体目标概念的提出,虽然并没有给文化规划带来技术层面的显著推动,但推动了从文化需求转向对于影响社区生活的社会文化结构和过程更为深刻的理解,对传统的以经济目标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改造和更新提出了质疑。由于综合式文化规划的编制通常涵盖公共文化设施、经济、旅游、教育、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社区文化发展、城市景观设计与环境改善、青少年和老年服务等广泛内容(Baeker, 1999),编制过程需要强大的资金、权利、规划机构和决策方,以及文化规划专家、城市规划师和社会文化工作者等多学科专业人员的协同工作,致使文化规划更多地社区层面上展开。

总之,文化规划虽已基本发展成熟,但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其进一步发展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探讨,如在发展理念、规划目标以及方法体系等方面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但在文化规划的内容体系、文化规划编制实施的部门协作(Dreeszen et al, 1994)、公众参与(Baeker, 1999)等方面面临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4. 2000 年以来以地方协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规划探索阶段

迄今,文化规划在西方城市已作为一种有效方法而建立起来,并融入到城市规划和设计之中(Evans, 2001)。文化在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核心地位的日益突出,促使构建“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体系,打造“创意城市”和“文化城市”甚至是“创意国家”,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主流,从而促使世界范围内各城市将文化发展提升到城市战略的高度,纷纷制定了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并加大了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投资力度,以期通过文化营销城市、丰富城市文化特色和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推进城市转型发展,从而在全球城市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西方城市的文化规划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目标一致:追求和强调社会认同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和场所营造,关注经济增长如何使当地居民和社区受益,关注城市地区或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或全面复兴(Evans, 2001),而不仅是商业或城市政府机构从中获益。新时期的文化规划不再仅被作为一种工具(Mills, 2005; Mercer, 2003),而以社区文化规划为主导形式,多集中于地方城市、文化地区和社区层面(Frost-Kumpf, 2001; Santagta, 2002),强调通过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公众的协商谈判,实现社区生活品质的全面提高。在美国,多数文化规划在社区层面展开,使决策过程更多地采用自下而上的途径,通过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团体参与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表述自身的文化需求和权利,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从而形成和谐相处的生活环境,增强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社区的全面发展(Dreeszen, 1994)。加拿大则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着手:宏观层面以社会公正和文化认同为核心,强调理论性和政策性,中观层面以部门协调和发展能力培育为核心,强调文化管理和发展能力建设,微观层面以引导公众文化参与和文化意识为核心,强调文化活动和文化自主性(黄鹤, 2005, 2010)。

以地方协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规划的探索,依托于发达国家城市建设已处于相对平稳的发展背景,更源于当地特有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动力机制,包括倡导式实用主义哲学的广泛普及,以及拥有丰厚的社会参与基础的城市管治结构。Hawkes 过去 10 多年一直在探索文化如何根植于公共规划概念中,并凸显其作用。本质上,文化可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文脉。但是,这些新型实践探索也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如文化规划并非艺术规划,文化规划关注焦点过于狭隘,仅聚焦于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和对文化活动、健康、安全等社区问题的考察,缺乏从城市规划视角对弱势群体的特殊重视和整体规划(Evans, 2001),公众参与的“非专业化”和难以取得既得利益群体的资源付出等,致使文化规划编制和实施遭受质疑(Bianchini, 2005)。

1.3 国内相关研究和实践进展

中国文化规划实践和理论探索并不同步,理论探索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应对现实需要我们编制了众多的文化发展计划或规划,但迄今为止尚没形成比较系统的文化规划理论体系,故此将中国文化规划实践发展与理论探索分开讨论。

1. 文化发展的实践历程

(1)1949—1992 年间的文化事业计划型文化规划发展阶段

以公共文化福利政策为核心的文化事业计划型文化规划发展阶段分为文化事业艰难发展时期(1949—1977 年)和文化事业重点发展时期(1978—1992 年)两个亚阶段。

1949—1977 年,是中国文化事业艰难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处于有文化事业无文化产业、有文化发展计划而无文化发展规划的状态。虽然在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文化均被视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程度和处理方法截然不同。计划经济时期,迫于改变落后面貌的需要,我国城市建设紧紧围绕工业化推进,文化发展未受到应有重视。虽然一些城市兴建了一批博物馆、影剧院和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用以满足人们基本的文化需要,但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制约,文化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规模均有限,文化活动也非常有限。而且,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城市的传统风貌和历史文化遗迹等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与西方国家重建时期一样,各级政府将文化视为独立于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之外的特殊领域,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之间基本没有联系。

1978—1992 年,我国文化事业进入重点发展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文化建设逐渐复兴。城市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关注首先源于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强调了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文化活动的开展,并关注了文化市场建设。例如,制定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更好地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等。这一时期,虽然文化发展成为政府的工作内容之一,但文化发展与城市整体发展的关系并不密切,政府部门成为文化领域的主要投资者和建设者,文化建设主要侧重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随着城市文化建设的开展,建立文化发展规划用以指导文化建设的需要日益迫切,学界和政府开始强调文化发展规划的重要性,倡导建立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到城市规划体系中,组织召开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等文化活动等。吴良镛先生于 1985 年在重庆的“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学术演讲中强调“就城市发展而言,除了研究和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外,还需要有一个文化事业的发展战略规划,使之能明确地向既定的共同目标协调发展”,“文化事业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内容。1986 年,广州召开了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将文化纳入到城市发展视野之中。然而,当时这些有益的探索往往止步于政策性、纲领性、口号性的呐喊之中,缺乏对文化规划内容体系和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建立有机联系,从而导致在实施操作层面效果欠佳。